

# 全球智库半月谈

全球复苏中的挑战：债务、技术转型、数字金融

金融科技与跨境支付

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

时代呼唤 EMF

地区房价监控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行为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丁丽伟

郭子睿

侯书漪

李笑然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伊林甸甸

杨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mailto: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mailto: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 目 录

## 世界热点

## 全球复苏中的挑战：债务、技术转型、数字金融 ..... 7

导读：本文为作者的一篇演讲。首先，作者回顾了全球经济复苏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全球经济复苏现状。认为各国在经济复苏上存在差距，各国间的发展不平衡正在加剧。其次，目前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巨大风险，较为脆弱，容易受到意外冲击的影响。最后，作者指出了影响全球复苏的三个因素：债务、技术转型和数字金融，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尽快制定响应政策。

## 金融科技与跨境支付 ..... 12

导读：本文是一篇在“中央银行峰会”上的演讲，聚焦于金融科技在跨境支付上的应用。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领域日新月异，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金融科技创新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带来了何种影响和挑战，在跨境支付上又有什么应用，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

## 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 ..... 19

导读：腐败阻碍投资的想法并不新鲜，但之前的文献往往侧重于平均腐败水平的影响。根据 13 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 14 万个企业层面的观察数据，本文探讨了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当腐败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外国企业不受腐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国内企业显著减少投资。这种投资下降伴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为贿赂目的建立资产负债表外基金的可能动机。

## 回顾美国历次对 201 条款的使用 ..... 22

导读：近期，关注国际贸易的人士都在观望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行使国际贸易委员会基于 201 条款所赋予他的权限，提高美国在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进口领域的贸易壁垒。本文回顾了历史上历次 201 调查，全面分析了使用这一条款的利弊，并且建议特朗普总统效仿历史上的历届总统，放弃行使这一权力。

## 全球治理

## WTO 新机遇 ..... 26

导读：十二月，全球贸易部长将齐聚布伊利诺埃利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它长期以来的差别待遇条款和建立共识机制已经脱离了时代的变化。目前，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拥有的的监督机制亟待建立。

**时代呼唤 EMF ..... 28**

导读：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的创立对欧元地区主权危机是有益的，然而对根治问题还远远不够。它虽然减少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但是仍然缺乏处理破产危机的有序方法。这使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不救援条款变得没有权威性。此外，对 ESM 的管理是急需的。而将 ESM 转变为欧洲货币基金(EMF)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主要问题。本文就此展开了一些讨论。

**聚焦中国****反腐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 31**

导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之一是反腐败斗争，腐败为老牌公司创造特权，从而阻碍创新和增长。本专栏显示，中国的腐败可能确实阻碍了公司发展的进程，反腐运动是一个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最终实现持续增长的良好举措。

**十九大报告彰显中国更加自信的对外政策 ..... 34**

导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上所做的工作报告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本次报告大多篇幅都在关注国内事务，但其传递出的关于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将更加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国际社会应当期待一个全面崛起的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国际角色。

**经济政策****地区房价监控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 36**

导读：宏观审慎政策是抑制房地产周期的有效政策，但通常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都是基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房价，而不能考虑国家内部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分化。本文认为首都城市的房价通常与其它地区房价存在分化，应该有针对性的建立调控机制，实施有差异的宏观审慎调控政策。

**经济理论****行为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 39**

导读：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们只能解释外生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本文使用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开发具有内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的应用突出显示了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均衡是如何根据经济体的灵活性而调整的。这些模型有助于解释商业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

**战略观察**

**吉尔吉斯选举展现出中亚存在不同道路 ..... 44**

导读：10月16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前总理索隆拜·热恩别科夫以54.3%的得票率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当选新一任总统。本文作者观察了选举结果公布前后吉尔吉斯国内的一些动态，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激烈的总统竞选过程折射出该国民主的脆弱，同时新总统需要灵活面对未来的挑战；但即便如此，此次权力交接过程展现出了不同于其邻国的民主特征。作者认为这次选举已经为该不自由的地区标识出一条不同道路的可能性。

**权力与目标相匹配：有关南中国海的一项提议 ..... 47**

导读：11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正式开启，这被视为他担任总统近11个月以来最重要的外访。在横田空军基地，他面对2000多名美日士兵大赞美国军力，称“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能低估美国的决心”“美国绝不会动摇”，而更多人紧盯的是，特朗普此行是否会阐明他的亚太政策。以南海问题为例，作者认为一味炫耀肌肉并不可取，美国应当明确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南中国海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排他性控制，同时为FSOP准则赋予更多现实意义，以扭转当前局面。

**在伊朗核协议上押注 ..... 50**

导读：据美国官员称，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13日宣布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国际核协议，不仅如此，他还会针对伊朗从导弹试射到支持暴力组织的一系列行径作出指责。如果特朗普认定伊朗没有遵循协议，美国国会将在60天内决定是否恢复此前中止的对伊朗制裁，继而可能导致伊核协议的撕毁。笔者认为对伊核协议的新立场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为避免总统不明智的决策，国会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伊朗核协议事件将成为对美国制衡制度的严峻考验。

**本期智库介绍 ..... 52**



## 全球复苏中的挑战：债务、技术转型、数字金融

David Lipto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为作者的一篇演讲。首先，作者回顾了全球经济复苏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全球经济复苏现状。认为各国在经济复苏上存在差距，各国间的发展不平衡正在加剧。其次，目前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巨大风险，较为脆弱，容易受到意外冲击的影响。最后，作者指出了影响全球复苏的三个因素：债务、技术转型和数字金融，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尽快制定响应政策。编译如下：

### 演讲全文：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一直很喜欢来德国，因为德国在很多制定全球经济政策的世界组织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给大家今天的讨论做个铺垫，我想对世界经济做个综述，即世界经济最近的积极进展以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需要应对的趋势变化。在这其中我将提出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重点提及一些我们需要关注的新兴问题。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的复苏正在加强，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解决关键的政策问题，以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强劲和稳健的增长，并保障金融的稳定，这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发布了最新季度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3.6%，明年增长 3.7%，均高于 2016 年的 3.2%。

这个结果是可喜的，但还不够。在我们讨论不足方面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所取得的成绩。

### 消费和投资

本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在拉动增长的动力中，投资非常重要，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企业对于实体投资非常谨慎，投资是典型的进口密集型活动，对于贸易增长贡献显著，而贸易增长使得经济复苏惠及全球。近几年，贸易增速首次高于 GDP 增速，这是好的现象。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经济复苏的范围在扩大。发达国家已经全部实现增长，欧元区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首次出现的。与此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如中国、欧洲新兴国家以及俄罗斯都保持着强劲增长。

以上这些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 75%左右（以 GDP 计算），还算不错。

剩余的 25%没有增长，这其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中的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尤其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有 46 个国家经历着 GDP 负增长。

很多国家仍然处于 2015 年大宗商品骤降影响的调整期，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该地区仅有少数国家开始试图恢复增长。但是，这些国家想要恢复到大宗商品繁荣时期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刚才提到的重要政策挑战之一。

国家之间复苏与未复苏的差距告诉我们，目前的复苏并不强劲。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尚未采取有效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还需要重点强调一点，经济复苏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距。例如，在发达国家中，实际工资持续处于低位。

这一方面是来自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归咎于技术发展以及贸易的影响。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民粹主义仇恨逐渐加深。

## 挑战

19 世纪英国记者 Walter Baghehot 曾经说过：“通常，最糟糕的决定都是在发展较好的时期产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在我们不得不行动的时候（如困难时期），最好的决定才会产生”。

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不当即采取行动。复苏时期的救助可能导致自满，但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保证经济复苏是持续性的。

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几家主要中央银行指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常化。目前宽松的政策环境仍然是有效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正在顺利展开。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低利率的金融系统，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IMF 刚刚发布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了市场趋势和风险。最重要的是，报告指出全球金融体系的复原能力正在增强。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提



高了资金和流动性缓冲水平，解决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新兴市场从低成本的资金流中受益，刺激了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报告强调了经济增长的漏洞，例如由于低利率，国家和投资者更容易受到意外冲击的影响，市场情绪的突然变化，或地缘政治事件都可能带来沉重的打击。

追求更高的收益，使得许多投资者被暴露于潜在的信贷、成熟度和流动性风险中。跨资产类别的波动性非常低，加剧了投资者的自满情绪。很多市场参与者都对这些问题表示担忧。

### 增长的负债

全球各地的负债正在增加。在 G20 国家，私人部门的杠杆已经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同时，低收入国家的负债正快速增长，如中国、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的非传统主权债务国家债务增长迅速。这些债务国运作于巴黎俱乐部之外，因此将使得债务问题复杂化，并推迟问题的解决。

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在金融负债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还款更加昂贵之前解决金融和负债的稳定性问题。

我刚才讲到银行在解决金融危机遗留的问题取得的成果。只有继续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将风险控制住。当然，这同样适用于欧元区，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提高成本效率必须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欧洲银行业联盟。

但是，仅解决私人部门问题是不够的。金融危机后，政府债务问题同样亟待解决。包括新兴市场债务、国家金融稳定以及刚刚提到的欧元区银行体系。

金融危机还将很多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人口变化和迁移，基础设施缺失，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问题以及教育短板等等。

IMF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很多，所以我主要关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是全球经济的新生力量，正寻求快速增长从而赶超发达国家。他们可能会通过投资、技术并购以及对劳动者进行教育等方式提高生产力。这最终将带来生活标准的趋同。

但是目前来看，趋同还未成定局。我们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将达到比发达国家高 1.5 个百分点左右。

总的来说，这听起来不错，每年追上 1.5 个百分点。但是，几个大型经济体的赶超速度非常快。中国、印度等国家每年的赶超速度将达到 4-5 百分点。实际上，剩下的 43 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是慢于发达国家的，他们正面临逐渐落后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抓住此次经济复苏的机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全球经济处于复苏时期，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容易。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从而重新出发，加速融合。

### 技术转型

第二个影响我们经济的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转型的潜力。我们在 IMF 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分析，下面我简单介绍我们研究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被称作“工作的未来”，即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正影响着产业的生产过程。如日本软银发起了 1 千亿美元的基金支持该领域的创新。

但是，我们仍不清楚这一过程将如何实现，包括在宏观经济的领域。这些技术是否会取代人，导致大量的人失业？或者这些技术是否为劳动者赋能，使其效率提升？亦或是 IT 的进步导致新的工作机会产生？

特别是，我们需要研究技术转型将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转型是否会使得低收入国家凭借自身迅速增加的青年劳动力加速工业化进程，甚至实现跨越式增长？或是技术进步是否会淘汰低技能工人，阻碍那些曾经凭借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实现增长的国家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是“网络安全”。最近听说某央行每隔十秒钟就会遭受一次黑客袭击。美国 Equifax 刚刚发生数据泄露事件。一次事故就会波及成千上万人，网络安全威胁将会越来越严重。

国际组织正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G7 已经开展了多项工作，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也在积极采取行动。

需要探讨的是，网络安全问题是否是分散性的、仅限于私人部门问题。还是说，IT 是一项全球的公共品，各国是时候考虑联合起来应对这一问题了。

当然，网络安全不是 IMF 擅长的领域。但是我们将为其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应用做好准备。

### 数字金融

第三个改变是数字金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 PayPal 或支付宝之类的在线支付平台。仅仅几年时间，中国城市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使用现金。在东非，M-Pesa 惠及上亿用户，而这些用户此前的生活并没有金融系统。

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金融科技如何推动发展。

但是，金融科技给传统的银行业系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线支付平台正像银行一样开展接待和投资业务，每个监管部门都应该关注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否完善。当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如金融科技公司正与监管机构合作，开发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仍需讨论广泛适用的金融服务体系作为参考。在数字化转型的下一个阶段，加密数字货币、新的交易结算技术的出现正扩大着我们熟知的金融服务边界。

所谓的分布式分类技术带来的瞬时交易已经超出了政府监管（包括货币政策）的范围。我们看到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讨论发行虚拟货币，并考虑如何监管比特币的问题。

同样，这一影响是巨大的。国家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制定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分良莠，制定出会扼杀创新的制度。

### 结论

总之，时间有限，我讲到了全球复苏、收入趋同以及技术变革方面的问题。一些问题我们已经有所研究，但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未涉及。每一项都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命运。我们有责任出谋划策，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

---

本文原题为“The Challenges to Sustaining the Global Recovery”。本文作者 David Lipton 为 IMF 第一副总裁。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金融科技与跨境支付

Dong He /文 唐雪坤/编译

导读：本文是一篇在“中央银行峰会”上的演讲，聚焦于金融科技在跨境支付上的应用。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领域日新月异，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金融科技创新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带来了何种影响和挑战，在跨境支付上又有什么应用，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编译如下：

很高兴今日能与大家在“中央银行峰会”相聚，共同探讨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而使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在仔细研究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关于金融领域可能的改变方式，我和我的同事收集了一些最初的想法，同时我们也权衡了金融制度和中央银行需要做出的反应。

如果想知道这些理论更深入的细节的话，你们可以阅读过去几年我们发布的两份员工讨论笔记，题目分别是“虚拟货币：初始想法”和“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初步考虑”。

然而，为了论证 IMF 的研究，上个月在英格兰银行，IMF 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做了一个演讲，分析了金融科技创新为中央银行带来的潜在挑战。

拉加德用让人振奋的口吻说：“我们有能力塑造一个适用于全球的科技与经济的未来，我们也有责任采取正确的政策做到这一点”

我今天在这里的演讲，将从三个大方面聚焦金融科技在跨境支付上的应用：第一，是一个经济框架上的简述，关于金融科技的应用会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第二，是最近跨境支付的背景，以及相应系统的改革；第三，是中央银行们的自身定位以及他们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 I. 金融服务的组织——一个总体架构

首先，我们先考虑一个总体经济的架构，这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金融科技带给金融部门的影响，也能预估金融制度将会做出何种反应。

科技可以影响新型服务的特征，比如说速度、安全性和透明度，以及被称为市场结构的服务提供者的组织。

技术进步可以促进新服务的开发和采用，尤其是针对未满足的用户需求时（我们可以称之为服务的“缺口”或“缺点”）。缺点越大，企业在技术进步所允许的情况下改善服务的动机就越大，用户对此类服务的采用也越快。

技术也会影响服务提供商的市场结构。究竟新技术是仅仅增加老牌厂商的利润和效率，还是会产生更深的影 响？具体而言，他们是会（i）减少对金融中介的

需求；还是会（ii）推动中介机构改变其内部结构（可能导致并购）；或者会（iii）促使新的中间人进入而取代过去的中间人？

技术可能会影响形成中介机构的因素。因为技术可以改变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市场不完善之处，这更提升了对可信任中介机构的需求，同时它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交易对手的知识的有限性），方便交易双方的匹配，降低交易成本。技术还可以影响中介机构横向或纵向整合的激励机制（像一般的银行那样向终端用户提供多种服务，或者是收购上游供应商）。最后，技术可以改变新中介机构的进入壁垒，使其能与现有对手竞争。

## II. 跨境支付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框架应用于跨境支付。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变革的领域，也特别能从新技术中获益。在今天的体制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部分来自技术限制，部分来自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

这似乎令人惊讶，但跨境支付与国内支付有很大不同。不过，就如下面这个简单的类比暗示的那样，未来很可能会不同。互联网广泛使用之前，在国内发送所谓的“蜗牛邮件”与在国际上发送邮件是根本不同的，价格差别很大，依靠的基础设施不同，而且处理跨境邮件还需要满足国际协定，包括支付、包装、跟踪、处理和其他过程。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传递给国内或国外收件人的信息没有区别：它们只需要一次点击即可。包裹只是一个包裹，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付款只是一种付款，无论它去哪里。

在进行跨境支付时，无论是家庭、小型企业还是大公司，各种类型的用户都特别重视低成本、安全、便利、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保证中间人将保持其信息的机密性。

### 跨境支付的缺点

跨境支付服务的缺点是实际存在的。首先，跨境转账费用昂贵，手续繁琐；此外，服务不透明，所支付的价格也不透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是否启动也不清楚；最后，跨境汇款很慢，付款可能会通过许多银行后才到达目的地，造成延误和额外费用。这些缺陷都是由技术、法规和市场结构造成的。

### 市场结构

现有中介机构受益于高进入壁垒，支付链的每个部分仍然高度集中。在许多情况下，壁垒源于与用户接触所需的高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同时也来源于遵守规章制度，建立服务信任等，而代理银行还需要经营大型后台。此外，对这些机



构而言，其规模对管理流动性和交易对手风险有重要影响。最后，网络外部性在信息传递和结算中也普遍存在，在后者的情况中，净额结算双边头寸可以降低成本，接触多个交易对手可以促进交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创新如何重塑跨境支付的前景？新技术能在大多程度上减少服务缺陷，改变市场结构？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中介机构来支持市场平台，从而重塑商业计划和企业边界，鼓励进入市场？监管又应该如何回应？虽然人们只能从某种程度上推测潜在的结果，但很大部分仍取决于技术采纳的情况。

有三种情况可以考虑，每种情况都以分布式总账技术（DLT）的应用为基准。按照潜在的中断顺序，DLT 的应用可以针对下列领域：（i）后端流程；（ii）合规性；（iii）支付手段。

### 后端流程

DLT 可以适用于跨境支付的各种过程，例如，代理银行们可以共享得到许可的 DLT 平台以自动对支付情况进行跟踪，以及对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状况进行优化。

在对市场结构影响不大的情况下，效率上的收益是最明显的。从理论上讲，较低的固定后台成本会降低规模经济，促使新型的服务提供商进入领域。然而，进入代理银行市场的许多其他壁垒仍然存在。

尽管如此，终端用户仍然可能受益，因为通过代理银行结算的付款将变得更加透明和可追踪。然而，对于在终端用户中的流通速度和成本的影响尚不清楚，因而代理银行可以保持寡头垄断从而转嫁。

### 合规性

当与其他技术相结合的时候，DLT 具有显著降低合规成本的潜力。特别是，了解客户能获得的效用和数字身份认证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并有助于降低合规成本，包括针对反洗钱/反恐融资（AML/CFT）的管制和制裁相关的控制。然而，在遵守领域内使用新技术可能受到更多问题的限制，包括相关管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允许金融机构外包客户尽职调查。

市场结构不会毫发无损。数字身份认证可以让终端用户在多个服务提供商之间更容易地进行选择，从而减少中介机构从客户的专有信息中获得的范围经济。但这都取决于现有服务提供商是否愿意分享这些信息，除非监管部门要求这样做。

新的合规性技术可能会给终端用户带来好处，但也可能会出现隐私和安全问题。虽然服务可能会变得更便宜，更具包容性，但 DLT 在遵从性上的应用同样



引起了人们对隐私和个人信息维护安全的关注。此外，数字身份认证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数字身份被第三方窃取和误用）。

## 支付方式

DLT 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全新的方式支付。随着虚拟货币的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这些支付手段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数字货币，在无需许可的（开放的）或已被许可的（完全私人或合伙的）DLT 网络中使用，就像现实中的现金一样。对这些系统的使用有效地将支付从基于帐户的系统转移到了基于数字货币的系统上。

下面两个以 DLT 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都与跨境支付相关。第一个应用是私人运营的轴辐式支付网络，用户交易使用的法定货币变为了虚拟货币（基于 DLT 的数字货币），通过 ATM 机、终端销售点、在线界面或其他方式（辐散式）存放在电子钱包里。然后，这些数字货币通过虚拟货币的安全网络（中枢轴）被转移到收款人的电子钱包中（可能是跨境的）。最后，数字货币按照所需以同样的方式兑换成外国法定货币。

这一应用关乎到市场结构，是拥有显著影响的，因为这种支付方式将对传统支付方式施加巨大压力，从而促进传统支付链的缩短。这之后，通过中央银行或代理银行进行的信息传递和结算都不再需要了。相反，在获得和发行环节中，虚拟货币交易所和电子钱包供应商将争夺客户，从而可能会抢走其他企业的大量业务。

从终端用户的角度来看，虽然轴辐式支付网络提供的支付服务的这些特征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有三个重要的警告需要注意。

虽说跨境支付可以更快、更易追踪和使用，付款也可能变得更便宜、更安全，但是以下三条警告不可忽视：

第一个警告是，虚拟货币潜在的不稳定估值会带来风险，并可能限制轴辐网络的使用，至少对于大额支付而言是如此。以目前的形式，考虑到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的汇率波动性，虚拟货币是不足以作为价值储存的手段的。

第二个警告是，缺乏对轴辐式支付网络的信任将会削弱其价值。正如传统的支付系统中纸币需要信任一样，对轴辐网络的信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交易对手需要对虚拟货币的所有权转让有法律上的保障；二是交易对手需要信任虚拟货币背后技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也意味着信任虚拟货币的发布规则（或背书规则）；三是用户需要信任虚拟货币交易的安全性，同时电子钱包提供商需要介入和管理轴辐网络事务。用户可能关心他们个人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其他是否拥有访问他们钱包的能力。接下来，监管机构可能需要

考虑对虚拟货币交易所和电子钱包供应商采取监管措施，以充分保护消费者，解决 AML/CFT 的担忧。

第三个警告是，网络之间缺乏的互操作性，可能会使轴辐网络中的交易价格保持在高位。如果网络不可互操作，网络外部性就可能很强，以至于供应商便可以利用市场力量收取高额费用。旨在解决反竞争问题的监管有助于缓解这一结果。

### III.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个可能的对 DLT 的应用——作为支付手段：中央银行可以提供自己的数字货币。

“央行的数字货币”——我们姑且先这样称呼，简称为“CBDC”——不会是一个平行货币，它只不过是中央银行货币的一种数字形式，可以以分散的方式进行交易。换言之，它可以直接从付款人到收款人之间传输或点对点交易，而不需要中介。

这样的 CBDC 交易会等同于中央银行的其他负债（现金和准备金）——无论是通过商业银行或是直接在中央银行进行。

#### 为什么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的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央行也从多方面考虑了发行数字货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考虑到 CBDC 的有效性，提出效率问题的论据是基于：为了抵制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可能赋予一个或多个私人运营商在支付系统或私人虚拟货币上的垄断力量，或者是因为无法确保私人编码和维持货币的完全稳定和安全。此外，CBDC 可以克服由于无法与电子支付的单一新技术标准达成一致而导致的无法协作的问题。在稳定性方面，基于 DLT 的 CBDC 比暴露在单点风险中的现行结算系统更加安全和更具弹性。

从零售角度来看，用 CBDC 逐渐取代纸币和硬币需要节省花在用于维护和替换国家纸币和硬币上的成本。同时，一些国家或地区很少或难以获得银行服务的个人和小企业的交易费用也能大大降低，并能促进金融包容性。此外，通过促进小额支付，CBDC 的应用可以加速新的、分散的服务型经济的采用和有效性。

第二个理由是关于货币政策的考虑。私人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潜在扩散可能威胁到中央银行货币需求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 CBDC 可以阻止这样的私人虚拟货币或者降低他们在支付系统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辅助角色。

另一个货币政策方面的考虑是，除了可能存储成本昂贵的小面额纸币外，用 CBDC 来取代现金可以让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将利率降为负数以履行其职责。然而，

这种潜在的好处是需要权衡的，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中央银行考虑，即尊重社会对货币形式的偏好。

### 发行何种央行数字货币？

在做出关于是否发行 CBDC 的决定时，中央银行也要考虑应该发行的究竟是哪一类型的数字货币？

在基本设定方面，CBDC 大概会遵循以下要求：以与法定货币相同的计量单位发行；作为央行的负债，可以按照面值与其他非权益负债（主要是现金和商业银行准备金）进行交易。

但是，CBDC 的其他特征会在一个或几个方面与商业银行准备金有所不同。重要的是，不管利息是否是用 CBDC 支付，都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有效性以及金融稳定有着重要而不同的影响。无息的 CBDC 是很好的现金替代品，带息的则是很好的银行存款替代品，而后者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稳定性可能有更大的影响。

关于发行的问题，央行必须做出决定。基本问题是如何发行数字货币以及向谁发行。最后一个问题关系到如何选择用于支持 CBDC 的技术，CBDC 生态系统的形式和广泛的规划将最终反映金融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在这些技术和规划上的选择又有一些问题，例如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安全，能否保证流通速度？这意味着谁将承担运营，维护和发展数字货币的成本？是中央银行吗？或者是让私营部门参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作为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经营者？

这些就是关于金融体系的性质和调控，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央和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方面，由于 CBDC 的引入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很多都是政策方面的复杂问题。这似乎就要求渐进式引入 CBDC，可能的话要建立在经验以及不断发展和成熟的金融技术的基础上。

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

随着金融科技创新加快步伐，金融中介、市场和新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市场进入壁垒正在改变，在某些情况下有所降低，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有所增加（特别是如果大型封闭金融网络的出现减少竞争机会时），但信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科技也有希望改善跨境支付的体验，包括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降低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法规的成本。

在一个变化的背景下，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正如我们的总裁拉加德女士在她最近于英格兰银行的演讲中所说：“为了让一切更顺利，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国家之间的互相对话。”

当您为改变跨境支付形势而努力时，IMF 准备好与您进行建设性地合作——旨在确保风险的最小化，并使经济能够充分呈现金融科技的未来希望。

非常感谢大家！

---

本文原题为“Fintech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本文作者何东（Dong He）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Monetary and Capital Markets Department）副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

Jan Hanousek, Anastasiya Shamshur 和 Jiri Tresl /文 杨茜/编译

导读：腐败阻碍投资的想法并不新鲜，但之前的文献往往侧重于平均腐败水平的影响。根据 13 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 14 万个企业层面的观察数据，本文探讨了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当腐败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外国企业不受腐败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国内企业显著减少投资。这种投资下降伴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为贿赂目的建立资产负债表外基金的可能动机。编译如下：

腐败阻碍投资的想法在文献中已经有据可查（Mauro 1995）。但是，现有的文献仅仅考察了国家平均腐败指数对投资的影响。这与企业如何做出决定并不完全一致。当企业做出像投资这样的前瞻性决策时，预期的腐败水平就被纳入决策过程，企业更多地担心不确定性。因此，开创性的理论集中在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上（Dixit 和 Pindyck, 1994），这一预测得到了 Leahy 和 Whited（1996）等实证研究的支持，他们发现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投资，Bloom 等（2007）研究表明（部分）不可逆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投资降低。最近的文献继续探究不确定性的影响。Gulen 和 Ion（2016）发现，当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投资会降低。Kim 和 Kung（2017）表明，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用更少可重新调配资产的企业投资的下降幅度很大。

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们继续探究不确定性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专门关注腐败的不确定性（Hanalyk 等，2017b）。由于腐败活动的诱发性和数据的可得性，衡量总体不确定性中的腐败不确定性占比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努力尝试在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数据库中（BEEPS）建立更细化的腐败变量（Hanousek 等人 2017a, Hanousek 和 Kochanova, 2016）。BEEPS 是一项对中欧和东欧当地企业的匿名调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BES）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这是腐败行为最为详细的数据来源（Svensson 2003）。我们的腐败不确定性衡量标准反映了特定环境下腐败认知的变化。

### 腐败不确定性下的投资

我们的最终数据集包含了 2001 年至 2013 年间，13 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 14 万多个企业层面的观察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腐败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当我们控制整体经济不确定性和腐败水平时，结果显示腐败的增加仍然与投资下降有关。这一结果对可替代的研究设计，子样本和其他控制不敏感。高度分散的腐败感表明腐败程度的高度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腐败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腐败越分散，投资越低。同时，这些结果对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很敏感。在腐败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国内控制的企业减少投资，而拥有外资控制权的企业则不受腐败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原因如下：首先，当进入外国市场时，那些想要保持外国控制的企业可能会与地方政府机构或官员沟通，以解决任何不确定性。其次，由于外国公司受到严格的反贿赂监管（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英国反贿赂法”和经合组织“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外国公职人员贿赂公约”），他们选择进入腐败不确定性不影响业务的环境中。这些影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公司的固定效应，当外国企业进入他们想要控制的的市场的时候，他们自己选择了没有腐败不确定性的行业存在——即腐败措施没有变化。我们论文基本的汇总统计数据表明情况就是如此。

图 1 2012 年腐败的不确定性



Source: BEEPS data, authors' computation. We acknowledge use of © EuroGeographic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for creating the map

### 不确定性会降低投资，但未收回的现金会怎样？

通常情况下，投资减少伴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增加。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腐败不确定性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是消极的。不确定性通常表明，公司拥有更多的现金来保护自己免受不利的冲击。但是，贿赂渠道也是现金。我们的研究表明，当腐败不确定性增加时，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持有量减少。假设其原因是公司需要建立更多的资产负债表外现金储备，以应对滥用官僚权力的不确定性。所有权水平的敏感性反映了投资模式的结果。只有投资决策受到腐败不确定性影响的企业才会通过调整现金持有量来应对。



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如下几个政策含义。首先，腐败水平的不确定性相对腐败本身，更不利于企业层面的投资。其次，企业对腐败导致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同的敏感度——不同的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外企似乎对不确定性并不敏感。最后，腐败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途径。一方面，现金持有量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大股东收购所致。另一方面，这些表外基金可以用来满足腐败官员的要求。

---

本文原题为“Corruption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practices”。本文作者 Jan Hanousek 为捷克科学院经济所教授，Anastasiya Shamshur 为东安格利亚大学诺维奇商学院副教授，Jiri Tressl 是中央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回顾美国历次对 201 条款的使用

Chad P. Bown 和 Junie Joseph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期，关注国际贸易的人士都在观望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行使国际贸易委员会基于 201 条款所赋予他的权限，提高美国在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进口领域的贸易壁垒。本文回顾了历史上历次 201 调查，全面分析了使用这一条款的利弊，并且建议特朗普总统效仿历史上的历届总统，放弃行使这一权力。全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近期正在考虑是否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施加更大压力。显然，这为当前充满猜疑气氛的国际贸易体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特朗普目前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来自于 1974 年通过的贸易法案中一条著名的条款——201 条款，这个条款使得特朗普可以采用关税或配额的方式，来抵消美国的贸易伙伴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最有可能受到 201 条款波及的国家包括：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墨西哥、泰国和越南。不过，特朗普的这些举动所蕴含的意味还远不止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特朗普未来可能的一系列举动，以及这些举动所将带来的潜在后果。

在明年 1 月 12 号之前，特朗普将最终决定是否对太阳能板的进口进行限制，这将对超过 85 亿美元规模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造成影响。此外，在 2 月 3 日前，他还将决定是否对洗衣机进口提高关税或降低配额。这两条决定当中的任何一条都将对美国国内消费者带来直接而显著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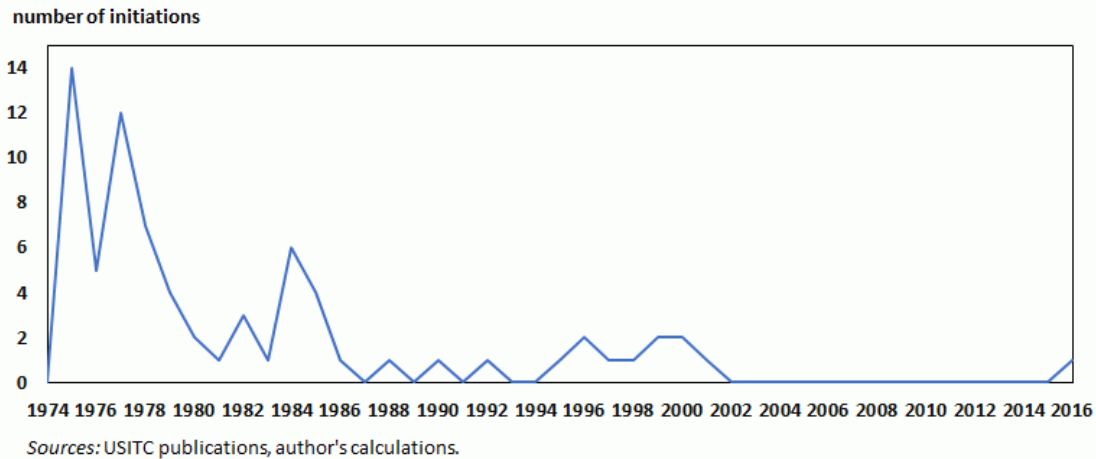
基于 1974 年贸易法案的 201 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已经完成了对上述两个行业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指出，美国国内企业的利益已经被这两个行业的进口所伤害。这意味着总统将有权力直接下达行政命令，提高这两个行业的关税壁垒。

从涉及行业的规模来看，本次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这两个行业的调查堪称是史上罕见的。尽管 201 条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但之前的历届总统鲜有使用这一条款的先例。以前的总统们放弃使用 201 条款的理由包括害怕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以及担心国内消费者受到冲击。因此，如果特朗普真的在明年决定使用 201 条款，那无疑预示着美国在未来几年内将与其贸易伙伴国爆发愈发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自 1974 年 201 条款被正式写入法律以来，有关 201 条款的历次调查都造成了哪些后果呢？图 1 展示了过去 42 年间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展有关 201 条款调查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到，在总计 74 起调查中，大约 80% 发生在 1974 至 1985 年间。最近一次走完了全部调查流程的 201 条款调查，则发生在 2001 年。

表 1 总结了这 74 起调查的诸多相关要素。如表所示，正如本次针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进口的调查一样，大多数调查的起因都是美国本土的企业、贸易联盟以及工会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申请。而在所有 74 次调查中，仅仅有 10 起是由美国政府自行发起的。

Figure 1 Initiations of US Section 201 investigations, 1974–2016



piiie.com

图 1 1974 年至 2016 年历次 201 调查的频率

Table 1 Use of Section 2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1974–2016

	Total	Affirmative vote	Tie vote	Trade barrier	Type of trade barrier						
					Tariff only	Quota only	TRQ only	VER only	Tariff and TRQ	Quota and VER	Tariff, Quota, and VER
Total investigations	74	35	5	19	7	2	4	3	1	1	1
... initiated by domestic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union	64	27	5	14	6	1	4	2	0	1	0
... self-initiated (i.e., by the US government)	10	8	0	5	1	1	0	1	1	0	1

TRQ = tariff rate quota; VER =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Sources: USITC publications, author's calculations.

表 1 总计 74 起 201 调查的相关要素

根据 201 条款的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有义务调查美国本土的企业是否因为进口行为而受到了伤害。在调查的最后，委员会的六位成员将进行投票，如果至少 4 名成员认为美国企业的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则调查将宣告结束。而如果 3 名或 3 名以上成员认为美国企业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则总统将有权决定是否颁布行政命令，来针对特定行业的进口提高贸易壁垒。在过去 74 次调查中，委员会总计通过了 40 次投票，授权总统进行进一步行动。

如果委员会授权总统采取行动，那么总统将得以从 201 条款规定的一系列政策选项中挑选自己的选择。总统可以提高的贸易壁垒包括有：关税、数量配额、以及与贸易伙伴国协商后决定的自愿贸易限额（VERs）。当然，法案也规定总统有权取消先前已经存在的各项贸易壁垒，并且可以采取前瞻性的政策，引导美国国内的企业和工人逐步撤离缺乏竞争力的行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委员会在历史上共 40 次授权总统提高贸易壁垒，但历届总统仅仅使用了 19 次这样的权限。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 201 条款不像反倾销法案那样被频繁地引用——因为反倾销法案并不依赖于总统的行政命令，只要委员会认为案件事实成立，新的贸易壁垒就会自动形成。

在总统批准过的 19 次限制相关产业进口的案例中，最常被使用的政策工具是关税、配额、以及二者的各种结合。相对而言，VER 则较少被使用，最近一次的使用可以追溯至 1984 年。至于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世贸组织在 1995 年通过的《保障措施协定》中限制其成员国使用 VER。由于 VER 使用的受限，201 条款在近 20 年间也就变得越来越不流行。

**Table 2 Section 201 investigations resulting in trade barriers, 1974-2016**

Year	Case No.	Description	Imports (2016 billions of dollars)	USITC determination	Outcome
2001	201-073	Steel	13.3	A	Tariffs, TRQ
1984	201-051	Carbon and certain alloy steel products	6.8	A	VER, Steel Import Stabilization Act*
1976	201-018	Footwear	4.7	A	VER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1976	201-019	Television receivers	3.4	A	VER with Japan
1977	201-029	Citizens band (CB) radio transceivers	3.3	A	Tariffs
1999	201-069	Certain steel wire rod	1.1	T	TRQ
1978	201-037	Bolts nuts and large screws of iron or steel	0.9	A	Tariffs
1975	201-005	Stainless steel and alloy tool steel	0.8	A	Quota, VER with Japan
1982	201-047	Heavyweight motorcycles engines and powertrains	0.7	A	TRQ
1982	201-048	Stainless steel and alloy tool steel	0.6	A	Quota, tariffs, and VER**
1980	201-043	Mushrooms	0.3	A	Tariffs
1979	201-039	Nonelectric cookingware	0.3	A	Tariffs
1985	201-056	Wood shingles and shakes	0.3	A	Tariffs
1978	201-035	High-carbon ferrochromium	0.2	A	Tariffs
1999	201-070	Circular welded carbon quality line pipe	0.2	A	TRQ
1998	201-068	Lamb meat	0.2	A	TRQ
1997	201-067	Wheat gluten	0.1	A	Quota
1996	201-065	Broom corn brooms	<0.1	A	Tariffs
1978	201-036	Clothespins	<0.1	A	Quota

Year = year of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A = affirmative, T = tie; TRQ = tariff rate quota; VER =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Note: \*Separate, but related to the Steel safeguard, President Reagan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 policy that resulted in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and the Steel Import Stabilization Act.  
\*\* President directed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negotiate VER.

Sources: USITC publications, Bureau of Labor Standards (BLS) Import Price Indices, BLS Historical CPI, author's calculations.

**表 2 19 次最终导致贸易壁垒提高的 201 调查**

表 2 向我们展示了这 19 起案例的其他相关信息。从表中信息可见，就涉及的规模而言，本次委员会讨论的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进口分别是史上第三大（85 亿美元）和第七大（18 亿美元）案例。历史上前两大 201 条款调查分别是：于 2001 年发起的针对钢铁进口的调查、和于 1984 年发起的针对碳钢与低合金钢的调查。至于其他调查，其涉案的规模则显得小得多。事实上，在总计 19 起调查中，超过 13 起调查的涉案规模都不足 10 亿美元。

基于史上历届白宫当局对 201 条款的谨慎使用，我们有理由建议特朗普总统以史为鉴，慎重考虑是否使用国际贸易委员会赋予的权限，提高太阳能板和洗衣机业的贸易壁垒。毕竟，考虑到美国长久的经济利益，绝大多数总统都抵制住了

使用暂时性、低效率且高成本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动。为了美国整体的经济利益，特朗普总统也应当如此。

---

本文原题为“Solar and washing machine safeguards in context: the history of US section 201 use”。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和 Junie Joseph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资深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11 月发表在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WTO 新机遇

HECTOR TORRES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十二月，全球贸易部长将齐聚布伊利诺埃利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它长期以来的差别待遇条款和建立共识机制已经脱离了时代的变化。目前，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拥有的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编译如下：

这个十二月，全球贸易部长齐聚布伊利诺埃利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随着过去支持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美国转而挑起贸易紧张局势，这次会议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向来不易。一些议题会被讨论到最后一分钟，而描述性语言也十分模糊。但是，这次结果会更加令人失望，因为代表们甚至无法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协议，来兜售他们的积极成果。

目前关于自由贸易的紧张局势植根于不均衡的利益分配，这是连世界贸易组织都无法解决的，遑论一次部长级会议。但这不意味着这次会议毫无意义。相反，它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继续作为国际贸易合作和信任建立平台的重要契机。

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关于“差别待遇”条款的。世界贸易组织 164 个成员国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宣布他们是发展中国家，适用于 1979 年首次提出的“差别待遇”条款。很多国家已经发展得更好了，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此项条款带来的优惠政策，即使是他们的一些行业已居世界前列。

我们很难说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享受无限期的优惠，在其国民经济各领域逃避承担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责任。同时，因为这些国家具有优势地位，很多发达成员国也拒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转而投向其它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截然相反。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希望看到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不愿如此。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则努力阻止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目前由两个重要的议题。其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发展，他们理应享受更大的权利。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差别待遇条款也应该更新，以确保它只让那些需要的国家受惠。在布伊利诺埃利斯的部长们应该真诚地讨论关于差别待遇条款的扩展。

第二个议题则是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建立共识。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下，多数问题都是由投票决定的。但是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协商一致做出决定。

这是明智而且不应改变的。尽管建立共识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过程，但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做出合理决定的唯一方法。简单的投票可能无法考虑不同国家



市场体量的区别。而加权投票会降低世界贸易组织通过调整权利和义务来调节不同体量国家间争端的能力。

问题在于，共识意味着绝对否定权，比如一个成员国可以否定任意对其它国家有利的提案。基于共识的解决方式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各成员国只有在违反本国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反对其提案。

巴黎气候协定是由一个简单的“Indaba”方法协商通过的，这种方法是由南非的祖鲁人和科萨人提出的。协商者只有在提出行之有效的替代建议时才有权反对提案。如果这种方法在巴黎行之有效，那么它同样可能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在布伊利诺埃利斯，部长们应该讨论如何确保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用负责任的方式反对他国的提案。

最后一个问题是部长们应该明白，世界贸易组织应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差别待遇条款和共识建立的方法都不是新提出的，但长期以来它们都被忽视了。如果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被施行了，这些问题根本不会影响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有有效的反馈机制来监督他们的职能。这些经费有限的监督机制使得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进行更加有效的进行协商和改革。这样独立的监督机制正是世界贸易组织需要的。

世界贸易组织不可能永远遮掩这些问题。而它面临的选择是，现在就实施改革，还是等待危机到来。

## 时代呼唤 EMF

André Sapir 和 Dirk Schenmaker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的创立对欧元区地区主权危机是有益的，然而对根治问题还远远不够。它虽然减少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但是仍然缺乏处理破产危机的有序方法。这使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不救援条款变得没有权威性。此外，对 ESM 的管理是急需的。而将 ESM 转变为欧洲货币基金(EMF)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主要问题。本文就此展开了一些讨论。编译如下：

主权债务危机本来不应该发生在欧元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根本没有关于如何处理这种危机的条款。因此，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0 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欧元区完全没有准备。这二者在此后互相促进，而欧元区的脆弱性也威胁到其自身的生存。

转折发生在 2012 年，欧洲稳定机制（ESM）建立，并开始欧洲银行联盟建立的第一步。如今，欧元区已经比五年前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仍在在未来可能的主权债务面前表现脆弱。建立一个应对危机的更好的框架应该是欧元区领导人首先考虑的任务。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成员国需要自己解决主权债务和金融问题。他们面临流动性和偿债能力问题是并没有一个一般性的解决机制。在欧元区经历过一系列的金融和主权危机之后，各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其严重性。因此，他们开始慢慢开发新的工具，来加强对银行和主权的监管、对主权债务和银行危机的管理及对银行危机的应对。ESM 就针对这些问题，分四步做出了改进。首先，加强对公共赤字和欧洲委员会债务的监管。其次，创立政府间工具 ESM，对欧元区有暂时性财政困难的国家提供援助。第三，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来加强欧元区的金融稳定性。最后，建立直接货币交易（OMT）设施。

尽管 ESM 已经比之前的框架有了许多改进，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弱点。首先，ESM 缺乏应对不可偿付危机的系统性方法。其次是银行业联盟的不完整性。第三是 ESM 的监管问题。而这些缺点可以通过将 ESM 转化为欧洲货币基金（EMF）来克服。它在财政上应该与欧洲央行在金融方面作用相当，能够在主权或金融危机时确保欧元区的稳定性。

将 ESM 转变为 EMF 能解决主要的监管问题。将主权和银行危机管理纳入到欧洲央行和欧洲货币基金中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金融体系的稳定依赖于其背后财政当局的能力以及能提供的支持。如果主权国无法提供可信的支持，银行业危机可能转变为主权危机。在欧元区，只要问题在于暂时性提供流动性，

欧洲央行应该并且能够防止或应对主权或金融危机。除此之外，保护政府和银行的稳定性应该是 EMF 的责任。在实践上，ESM 应该承担目前由 ESM 承担的一些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扩展，采用一个不同的管理模型。这种扩展主要强调主权-银行关系的两个表现：主权危机和金融危机。

像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一样，EMF 也不可能完全逃脱政治的干系。它们不可能使得欧盟的财政政策在各国得到严格执行，完全避免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一个更有可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欧洲主权债务重建机制，来确保欧元区有秩序的决算，来使得欧洲条约不救援的条款真正生效。该机制将同时具有调整和金融功能，可以在未偿付主权债务借贷双方之间开启、推动协商，从而达成一个减少债务人未来责任折现价值的协议，从而重建其公共参政的可持续性。另外，还有被所有债权人认可的专门法庭解决此类问题。

新 EMF 承担的另一项责任是对金融危机的管理，它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在合适的决策制定层面上，使得参与各方动机与责任相匹配。这一原则也应该被用于处理危机来。单一决算董事会已经负责了欧元区的决算，管理单一决算基金，也应该有一个由管理决算的机构同时管理的欧洲存款保证金计划。这个新的欧盟实体可以被称为单一决算和存款保证金基金。这种功能的结合使得快速决策成为可能。

EMF 的作用是在财政上支持欧元区金融系统。这一作用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直接资本重构工具实施的过程应该被简化，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立刻实施。其次，EMF 应该被允许参与到预防资本重组的过程中来。第三，它应该能够为单一决算和存款保证金基金提供信用额度。

EMF 扮演的角色使得对其的管理应该与对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管理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要废弃阻碍 ESM 决策的一致性原则，而采取绝对多数原则。除此之外，对 EMF 究竟应该属于像 ESM 和 IMF 一样政府间组织，还是想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央行一样的欧洲机构，还存在一些争议。不过要注意到，一致性和绝对多数的问题与政府间还是欧洲机构的争议是分开的。无论在哪一种机构内，一致性都不是必须的。

将 EMF 建设成一个欧盟机构将给予其更大的欧洲合法性。在 ESM 内，所有重要决策都由管理委员会做出。在 EMF，管理委员会可以由欧元集团的财长，欧元区各国财长及其他一些欧元区的代表组成，他们一起形成一个“财政政策的欧元系统”。这将取代非正式的欧元集团，负责欧元区所有的财政决策，也将在政治上与独立的欧洲央行发挥相似的作用。

总之，本篇关于将欧洲稳定机制（ESM）转变为欧洲货币基金（EMF）的建议书试图在市场规则和风险分担之间达成平衡。后者来自于 EMF 在主权和金融危机早期介入，而非充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能力。这种能力比 ESM 已经大大提高。同时，EMF 充当包括欧洲存款保证金机制的完整的行联盟财政后盾的能力也为此提供了保证。ESM 向 EMF 的转变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应该被看成是欧元区财政组织更广阔的制度变革的其中一部分。这些变革旨在更好的管理主权和债务危机，并在较为乐观的形势下改善经济状况。

---

本文原题为“The Time is Right For a European Monetary Fund”。本文作者 André Sapir 和 Dirk Schenmaker 都是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反腐对中小企业的影晌

Mariassunta Giannetti 和 Xiaoyun Yu/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之一是反腐败斗争，腐败为老牌公司创造特权，从而阻碍创新和增长。本专栏显示，中国的腐败可能确实阻碍了公司发展的进程，反腐运动是一个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最终实现持续增长的良好举措。编译如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飞速的增长，目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上层。创业活动和新公司的进入对于刺激发展阶段的增长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然而，与关联公司拥有特权、妨碍新进入者公平竞争有关的腐败可能成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

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政府把腐败视为对共产党生存的威胁，并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习近平执政后的第 19 天，发起了反腐运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比以往任何反腐尝试都更为深远和持久。

### 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在最近与中央财经大学的廖冠民教授和厦门大学的游家兴教授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反腐运动对腐败有效性所产生的负面冲击，而这种负面冲击应在更大程度上有利于腐败较为盛行的行业中的小型创业公司。我们发现，中国的腐败可能确实阻碍了发展进程，反腐运动是一个有助于有效配置资源和创业公司进入、最终实现持续增长的有效举措。

我们使用大型的专有数据库来探讨与存在腐败现象的现有企业竞争对小型创业公司的表现和进入模式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提供了公共和私人公司样本的综合信息，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在不同地理区域、行业和规模种的分布情况。这让我们的分析能直接影响到腐败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

另外，我们观察了企业为获得政治好处所做的努力。娱乐费用——一项出现在所有中国企业的盈亏账户中的项目——与企业为获得更好的政府服务和降低税收所花费的金额高度相关。娱乐费用也常常与腐败一起被新闻媒体所提及，并且在现有的文献中被广泛用于衡量潜在的腐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行业内大型公司的平均娱乐开支来衡量创业公司在其所从事的行业中可能面临的腐败程度。

我们发现腐败对创业公司的业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与花费更多娱乐费用的大型同行竞争时，小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差，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小公司的投资更少，销售增长更低，并且比同行业规模中等的公司面临着更高的融资成本。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所有检验中，反腐运动开始后，大企业的娱乐开支的负面溢出效应就被抑制了。这表明对腐败有效性的负面冲击有利于创业活动。

所有的结果都是通过控制公司级的娱乐费用并纳入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的相互作用来获得的。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能由省级冲击驱动来解释。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大公司的娱乐开支不太可能对大公司的其他特征如规模和杠杆率等产生影响，但这些特征可能反过来会与小公司的业绩相关联。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出，大型企业娱乐费用较高的省份，其创业型企业的表现较弱。在这些测验中，我们能够通过纳入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相互作用来吸收行业水平的冲击，表明行业冲击无法推翻我们的发现。

最后，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大公司的腐败行为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发现，如果这些公司在娱乐开支较高的行业经营，那么劳动力（资本）就不太可能分配给劳动力（资本）边际生产率高的企业。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运动开始后，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也有所改善。

腐败似乎对创业活动的地理分布也产生了影响。这一点毫不奇怪，由于腐败会降低行业中初创期公司的利润，所以如果同一省份和行业的大公司在上一年的平均娱乐费用高，那么年轻公司的比例就会降低。这不仅包括一般的新公司，也包括高生产力的新公司。

### 更广泛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腐败的负面溢出效应，并且对公司治理文献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正如企业融资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都试图通过聘用政治家加入董事会和其他职位、通过或多或少的合法游说活动、向政治派别提供财政支持或行贿等来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如宽松的税收和监管政策、以及能够更方便地进行融资等。

许多论文表明，各个国家很多公司的股东都从以上这些行动中获得了好处。然而，我们却缺乏关于这些行为导致了多大的社会成本的证据。



我们记录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可能机制，即通过提高一部分现有企业的租金，腐败可能会扼杀创业活动，降低小型创业公司发展和与现有同行竞争的能力。

---

本文原题为“The impact of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small and incumbent firms in China”。本文作者是 Mariassunta Giannetti 和 Xiaoyun Yu，前者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和 CEPR 的研究员，后者是印第安那大学凯利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十九大报告彰显中国更加自信的对外政策

Bonnie S. Glaser 和 Matthew P. Funaiolo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上所做的工作报告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本次报告大多篇幅都在关注国内事务，但其传递出的关于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将更加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国际社会应当期待一个全面崛起的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国际角色。全文如下：

在十九大的开幕报告中，习近平系统地向世界阐述了对中国未来的规划。这篇用时超过三个半小时的工作报告，通篇体现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强烈向往。尽管本次的工作报告重点放在了国内的建设成就、目标与挑战上，但透过这篇报告，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习近平谋求带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习近平对中国的综合国力势头相当自信，并且判断国际局势正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考虑到中国正在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的大背景，我们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工作报告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习近平提出的两阶段的长期发展战略。这两个阶段是：在 2035 年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 2049 年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于前一个阶段的论述大多强调的是各项国内事务，唯一提到国际部分的是：中国将在这个发展阶段成为全球创新大国；而第二个阶段的论述则大幅突出了中国在未来国际舞台的愿景。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在这一阶段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明确指出，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顶层设计是建立在对国际局势的有利判断的基础上的。除了“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局之中”，习近平在报告中还做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正蓬勃兴起”，以及“国际秩序正在加速变化”的重大论断。他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无疑表明北京当局对国际局势的发展非常乐观。同时，这些论断也体现出中国当局对美国综合国力持续衰落的预判。这种预判最早兴起于全球金融危机，而到了今天则在中国的决策层中变得更加主流。

结合中国当局对美国前景的悲观预测，以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决策层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为何习近平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抱有空前的拥护态度。从本次工作报告提出的诸多论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最高决策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积累的成功经验给世界、尤其是那些渴望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是本次报告的一大看点。尽管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目标，但习近平在报告中反复明确了一点：中国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正在空前加强。报告明确提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种提法并不出乎外界预料，毕竟，历史上每一个崛起的强国都希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考虑到中国对加强其国际影响力的追求，以及对引领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意图，我们恐怕只能更加相信，中国在未来确实谋求取代美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本次工作报告印象最深的部分，是报告不加掩饰地将中国模式描绘为一种可以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分庭抗礼的替代方案。不言而喻，这从长远意义上意味着与美国的正面冲突，而这种观点在以往的党代会报告中都是不曾出现的。显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决策者们对中国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发展都空前自信，这也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谋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倘若真是如此，几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重建其大国地位的漫漫征程时，我们一定会将本次党代会报告作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次报告标志着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全面复苏了对自身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无疑是实现其民族复兴的必备元素。

---

本文原题为“Xi Jinping’s 19th Party Congress Speech Heralds Greater Assertivenes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本文作者 Bonnie S. Glaser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资深亚洲事务研究员、“中国力量”项目的主任；Matthew P. Funaiole 是 CSIS “中国力量”项目的成员。原文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地区房价监控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Grégory Claeys, Konstantinos Efstathiou 和 Dirk Schoenmaker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宏观审慎政策是抑制房地产周期的有效政策，但通常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都是基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房价，而不能考虑国家内部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分化。本文认为首都城市的房价通常与其它地区房价存在分化，应该有针对性的建立调控机制，实施有差异的宏观审慎调控政策。编译如下：

房地产泡沫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般会带来经济较深的衰退。宏观审慎政策是抑制房地产周期的有效政策，但通常来看宏观审慎政策都是基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房价，而不能考虑国家内部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分化。尤其是首都城市的房价。

首都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部分源于一些结构性因素，如较快的人口增长。新型服务业和高科技公司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这些公司通常将总部设置在大城市，拥有便利的机场和良好的生活设施，而工业企业更倾向于分布在全国各地。但首都城市通常住房供给不足，施工计划比小城市更加严格，在需求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房价的暴涨。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缓解房价的周期性问题，但这些政策都是基于整个国家的房价而制定的，是否有助于解决首都城市的问题呢？

2016年11月，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基于中期房地产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对一些国家发出警告。这些国家的脆弱性源于高房贷和潜在的房地产价格波动风险。尤其是在瑞典、丹麦和英国，人们对房价的快速增长和价格高估表示担忧。

另外，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认为风险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体而言，欧盟的安全体系以及与住宅性房地产相关的监管要求，似乎使得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加的具有弹性。此外，欧盟已经实施了以借款者和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但欧洲风险系统委员会认为这并不能保证完全防控风险。

### 国别经验

在荷兰，2010年的贷款房价比为112%，到2018年预计会下降至100%。荷兰金融委员会建议未来的政府在2018年后应以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降低住房抵押贷款房价比率至90%。这项建议对于荷兰整个国家

房价的增幅 6%，是行得通的。然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房价每年上涨 15%，该政策会给阿姆斯特丹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在丹麦私人购房者要求首付比例至少是 5%。然后，由于国内房价的分化，丹麦金融监管局有额外 7 条规定来指导高房价和房价高增长的地区。2017 年 3 月，丹麦系统风险委员会建议对高房价地区实施新的抵押贷款上限，这些地区包括哥本哈根及其周围地区和奥尔胡斯。

2010 年瑞典的贷款价值比率为 85%。2016 年，瑞典金融服务管理局决定对高杠杆负债的抵押贷款人实施推销。特别的，贷款价值比超过 70% 的抵押贷款者每年至少以 2% 的原始金额来推销，当贷款价值比处于 50% 至 70% 之间时，这一比率下降至 1%。该政策在刚出台时遭到质疑。最终在 2017 年 5 月，管理局宣布如果 DTI 比率超过 450%，建议每年以额外增加 1% 的速度进一步收紧推销需求。

2016 年，芬兰的贷款价值比率最高达到 90%，其中 95% 是首次购房者。金融服务管理局认为在合适的情况下，可能会将限额降低 10%。

在英国，对于债务收入比超过 450% 的借款人的新贷款采取限制。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同样要求借款人在进行抵押贷款前进行压力测试，这项测试可以得出借款人是否能在首个 5 年内当借款利率上涨 3% 后仍能内负担得起。法国没有以借贷为基础或以抵押为基础的宏观审慎措施。然而尽管没有官方限制，事实上法国借贷机构都采用一套标准，即所有住房贷款偿还金额不得超过贷款者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 政策选择

可以发现，除丹麦之外，上述所有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国家房价层面的，并没有考虑首都城市与全国房价的分化。国家政策是基于房价的平均增长，对于抑制首都房价没有什么效果。

那我们能否有针对性的对首都城市或者一些地区实施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呢？

首先是确定首都城市和其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存在，这一差异化的方法是可行的。韩国曾经做到过。15 年前，韩国根据邮政编码实施差异化的 LTV 和 DTI 比率。在“投机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 LTV 比率限制，不管住房的类型和抵押贷款的数量和期限。那么如何判断“投机地区”呢，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上个月房价涨幅超过了全国 CPI 的 1.3 倍；第二，前两个月

的房价增长率是全国前两个月房价平均增长率的 1.3 倍以上。类似的框架也可以应用于欧盟国家，以防止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过热。

然后，我们需要加强对这些地区房价的监管来决定何时加强或者放松。然后，针对房价设立一个机制触发点是很困难的。对于有关当局来说很难知道在给定的时间内房价的准确增长率，因为房价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

运用历史数据有助于建立一套准则。刚开始，我们建议每年 5% 至 10% 的房价增长是密切监控区间。当超过 10% 的增长幅度时，需要进行“遵从或解释”管理：“遵从”意味着宏观审慎政策需要收紧，“解释”是指为所缺乏的措施给出理由。宏观审慎机构能在半年一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上出台一些指示和措施。可以通过收紧 LTV 或 DTI 或两者的限制来收紧宏观审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繁荣-萧条周期可能会被抑制。

---

---

本文原题为“Spotting excessive regional house price growth”。本文作者 Grégory Claeys 是 Bruegel 的研究员；Konstantinos Efstathiou 是 Bruegel 的研究员；Dirk Schoemaker 是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行为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Paul De Grauwe, Yuemei Ji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们只能解释外生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本文使用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开发具有内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的应用突出显示了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均衡是如何根据经济体的灵活性而调整的。这些模型有助于解释商业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编译如下：

行为经济学作为考虑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的方式，越来越被学界接受。最近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被授予诺贝尔奖证明，经济学界内部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允许偏离最初“理性人”的范式。

然而，主流宏观经济学中这类情况少得多。理性人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依旧处于最高地位。在这些模型中，个体代理人依据所有可用信息（包括模型中嵌套的信息），理性预测完整的效用最大化函数。完全理性的代理人做出的模型也是不可能出错的，他们具有杰出的优化能力和良好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让他们能准确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只有外部的干扰才能使这些代理人脱离正确的轨道，迫使他们重新优化。因此，这些模型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由外部事件（冲击）导致的，而冲击迫使个体重新考虑他们的最佳计划。模型中没有任何东西会造成内生的商业周期变动。繁荣和萧条都是外部干扰的结果（Smets and Wouters 2007, Galí 2008）。

### “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因此我们一直在试图出版文章不断完善这个领域（De Grauwe 2012, De Grauwe 和 Corrado 2015, De Grauwe 和 Ji 2016, 2017a）。当然，我们并不是只探索宏观经济模型的不同轨迹。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发 ABM 模型和“行为”宏观经济模型（Alfarano 等 2005, Tesfatsion 和 Judd 2006, Colander 等 2008, Farmer 2006, Farmer 和 Foley 2009, Gatti 等 2011, Gabaix 2014, Westerhoff 和 Franke 2012, Hommes 2016, Hommes 和 Lustenhouwer 2016, Muellbauer 2017; 另见近期对 Blanchard 2017 的批评以及 Gürkaynak 和 Tille 2017 的相关章节）。

主流的宏观经济模式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我们选择假设代理人有认知限制，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相反，这些代理人使用简单的规则进行预测（启发式的），并在事后评估这些规则的表现情况。评估可以使他们用最好的规则进行预测。可以说，在一个人类无法充分理解的复杂世界中，这样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可能是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理性方式（Simon 1957, Gigerenzer and Selten 2002, Akerlof and Shiller 2009）。

在其他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这种适应性学习，假设产生了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推动商业周期的内生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动物精神）浪潮。这也导致了双向因果关系，即乐观（悲观）导致产出增加（下降），而产出的增长（下滑）加剧乐观（悲观）（De Grauwe 2012, De Grauwe 和 Ji 2017a）。

这种动物精神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出缺口的运动特点是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交替出现的宁静时期和反映繁荣或萧条的剧烈运动时期。从技术上讲，这意味着产出缺口和产出增长的分布是非高斯的，表现出厚尾性。

现在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出缺口（以及产出的增长）并不呈现高斯分布，而是具有过度峰值和厚尾。Fagiolo 等人（2008）和 Fagiolo 等人（2009）进行了重要的计量经济分析，记录了产出缺口分布和 GDP 增长率的非正态性。因此，我们的行为经济学模型预测，在现实世界中，产出缺口并不遵循正态分布，而是以过度峰值和厚尾为特征。产出变化时间间隙较大的特征是在模型中内生的，而不是强加的所谓在经济面临随机冲击时的特征。

本模型与标准 DSGE 模型的对比是显著的。这些模型很难解释产出缺口分布中的厚尾现象。他们不得不用大的外生冲击来解释商业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特征。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仅将解释商业周期的责任转移到外部力量上。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最近将金融部门的影响整合到 DSGE 模型中来解释商业周期的努力。然而，这些模型的结果取决于冲击是连续相关的假设。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标准的 DSGE 模型没有内生的商业周期理论。

### 模型应用：结构改革如何影响商业周期的本质

我们用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商业周期高度同步。除非（再次）假设共同的外生冲击，否则这种现象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是不容易解释的。我们将行为模式扩展到两个国家，发现该模型能够产生强烈的动物精神国际传播，进而导致商业周期的强相关性。这些发现接近观察到的相关性。我们的模型可以实现这一点，且不需要引入共同的外部冲击（De Grauwe 和 Ji, 2016）。

在我们最新的论文中，我们使用了相同的行为模型来分析结构改革如何影响商业周期的特点，以及中央银行在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的能力（De Grauwe 和 Ji, 2017b）。

我们通过两种渠道在这种行为模式的背景下引入结构改革。首先是运用通货膨胀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供给方程）的产出缺口敏感度。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的低敏感性表明了工资和价格的粘性。

我们引入结构性改革的第二种方式是改变供给方程。这也是结构改革在标准 DSGE 模型中被建模的方式（例如 Eggertson 等，2014, Cacciatore 等，2012，

Everaert 和 Schule 2006, Gomes 等, 2013, ECB 2015)。在这些模式中,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放松就业保护, 降低失业补助金等等; 在产品市场上, 改革措施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减少新企业的进入壁垒。这些改革导致货物和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涨幅下降, 使宏观经济更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 这些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使供给曲线向右移, 增加了国家的生产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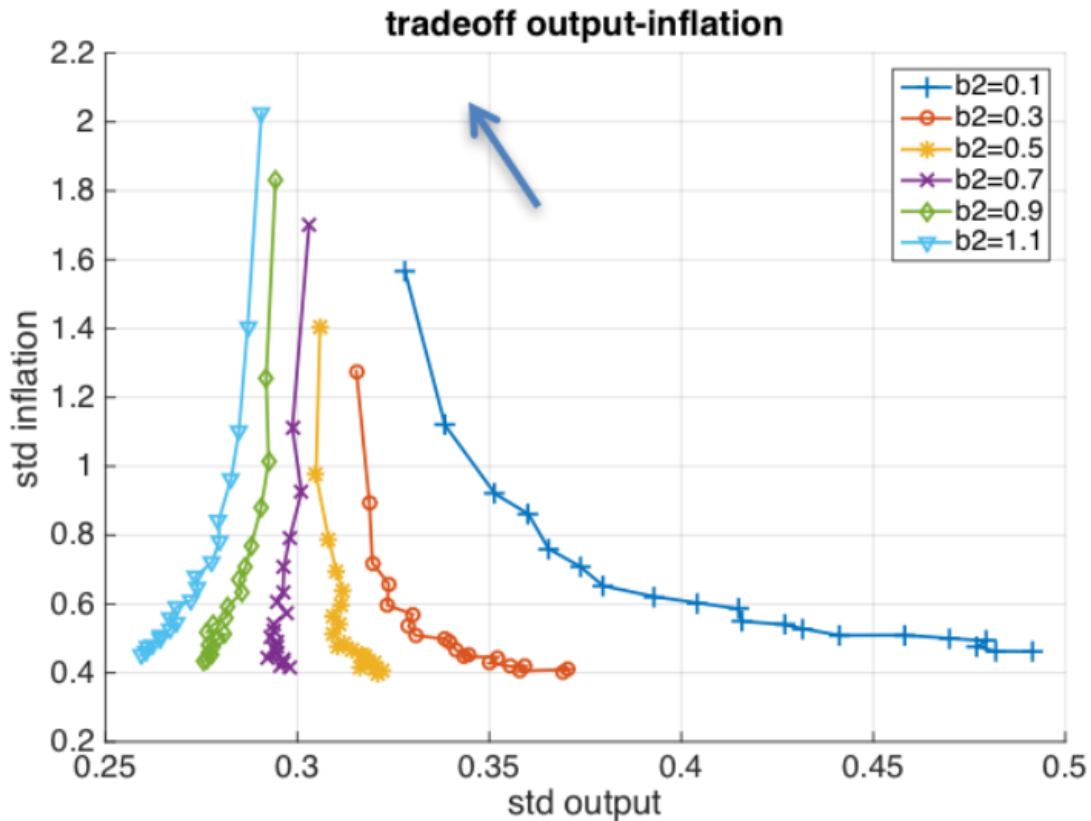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 增加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结构性改革可能对商业周期的动态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更灵活的经济体系(更高的工资和价格弹性)下, 动物精神的力量减弱, 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这与一个事实有关, 即在更灵活的经济体中, 价格和工资在调整新出现的不平衡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这种现象减少了商业周期的波幅, 结果造成乐观和悲观的思想浪潮创造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空间减少。

我们分析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改革如何影响当局的货币政策选择。为此, 我们建立了不同层次灵活性的中央银行的政策权衡。后者以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b_2$ )的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敏感度来衡量。这些权衡如图 1 所示。这些指标衡量的是中央银行在通胀控制增加时(通过利率对泰勒规则下通货膨胀变化的敏感度来衡量)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的选择。

为了理解图 1, 让我们首先关注低灵活性( $b_2 = 0.1$ )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对应组合的变化趋势是负向倾斜的。从这条线的顶端开始, 我们看到, 通过增加通货膨胀控制(通过泰勒规则中的通货膨胀参数  $c_1$  来衡量), 会导致通货膨胀波动性的下降, 从而导致更多的产出波动。随着灵活度的增加, 我们观察到权衡曲线向左移动, 变得不太负向倾斜。对于超过 0.5 的  $b_2$  值, 这些权衡成正斜率——也就是说, 当  $c_1$ (泰勒规则中的通货膨胀参数)增加时, 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波动率都会下降。

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经济非常僵化时, 一个追求通货膨胀目标的中央银行将面临通货膨胀与产出变动之间经典的负相关关系。当经济足够灵活时, 这种关系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银行可以在提高产出的情况下追求收紧的通货膨胀目标而无需付出代价。换句话说, 在一个灵活的经济体系中, 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稳定通货膨胀所做出的努力也会改善福利。当经济太僵化时, 情况并非如此。

图 1 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



这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即灵活性总是改善福利，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从图 1 我们可以看出，正向倾斜的“交替关系”向上和向左移动（箭头所示）以提高灵活性（ $b_2$ ）。这意味着如果中央银行保持通货膨胀控制不变，增加灵活性就会产生一个负面倾斜的新的交替关系——也就是说，更多的灵活性会降低产出波动性，从而导致更多的通货膨胀变动率。

这种发现使我们能够通过连接与泰勒规则的不同膨胀参数相关的点来推导出这种新的交替关系。我们在图 2 中给出了给定的  $c_1 = 1.5$ （通货膨胀参数）和  $c_2 = 0.5$ （输出参数）的结果。这表明了我们为提高灵活性水平而获得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率之间的关系，假设中央银行保持其通胀控制不变。横轴表示输出的标准偏差；纵轴是通货膨胀的标准偏差。我们获得了非线性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从 A 点开始分析。当灵活性为零时（即工资和价格对产出缺口的变化没有反应），我们得到点 A。随着我们增加灵活性的程度，我们沿着该线的向下倾斜的部分向下移动。这种下行意味着增长的灵活性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即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随着灵活性的增加而下降。换句话说，当我们从 A 点向下移动时，福利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当我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越了最低点。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得到了一个负相关的倾斜关系（即灵活性的进一步增加导致产出的波动性减小，而通货膨胀波动加剧）。

图 2 灵活性的最佳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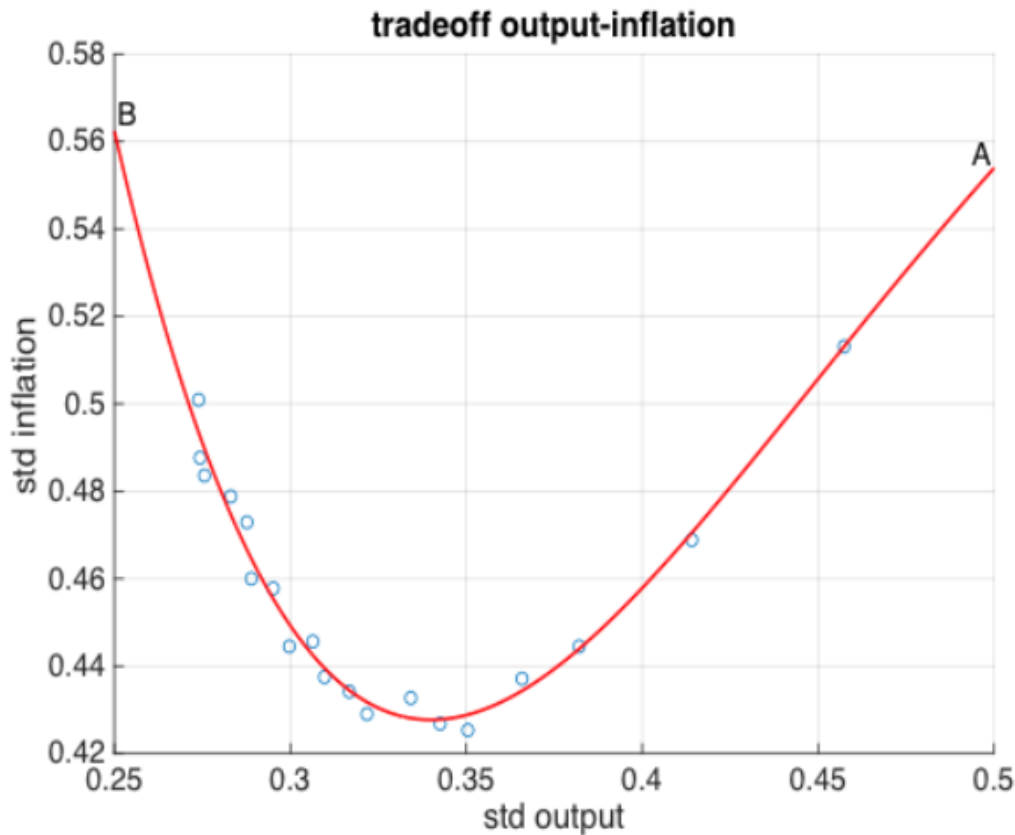


图 2 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最佳灵活性水平的一些见解。显然，这必须位于交替关系最小点的左侧。正倾斜部分上的任何点都可以通过增加灵活性来改善。除了最低点之外，灵活性的进一步增加导致产出波动率下降，而通货膨胀波动性则会上升。何处能达到最佳的灵活性，取决于对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的偏好。

### 总结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灵活程度对央行在稳定经济的尝试中所取得的平衡具有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经济灵活性高的经济体中，不会刚性较强经济体那样，有可能面临通货膨胀与产出水平降低同时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喜欢能增加经济灵活性的结构性改革。当然，我们也发现，灵活性能给中央银行提供的收益终究是有限的。

---

本文原题为“Behavioural economics is also useful in macroeconomics”。本文作者 Paul De Grauwe,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前比利时议会议员；Yuemei Ji 是伦敦大学学院讲师。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吉尔吉斯选举展现出中亚存在不同道路

Kate Mallinson /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10月16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前总理索隆拜·热恩别科夫以54.3%的得票率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当选新一任总统。本文作者观察了选举结果公布前后吉尔吉斯国内的一些动态，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激烈的总统竞选过程折射出该国民主的脆弱，同时新总统需要灵活面对未来的挑战；但即便如此，此次权力交接过程展现出了不同于其邻国的民主特征。作者认为这次选举已经为该不自由的地区标识出一条不同道路的可能性。编译如下：

看起来，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进行中亚地区首次民主的权力交接。10月16日，吉尔吉斯选举委员会公告结果显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SDPK）候选人索隆拜·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在初选中赢得了54.3%的选票，同时其主要竞争对手、商人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Omurbek Babanov）获得了33.4%。在一场充满相互攻讦的选战之后，热恩别科夫获得的多数票出人意料——此前人们广泛相信，这两位前总理的支持率接近，将需要第二轮投票以决胜负。

迄今为止，对于这一未预期到的结果所作出的反应都是和平和有分寸的，这点令人鼓舞。巴巴诺夫赢得了其家乡塔拉斯省近90%的选票，但输掉了该国南部地区。对于失败，他表现得很坦然，提议双方基于选举结果作出一些妥协交易。巴巴诺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并敦促其支持者冷静应对挑衅。同样充分意识到潜在的不稳定，即将卸任的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在预选阶段阻止了一些有问题的司法竞争并任命巴巴诺夫的支持者担任政府高级职位。

作为阿坦巴耶夫追随者的热恩别科夫能够获胜，除了其在南方（在该地区他背后是该国最有力的政治派别之一）的人望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来自克林姆林宫的间接支持和广泛使用政府资源非常重要，也得益于选民投票支持阿坦巴耶夫过去六年的稳定形势。过去十年，在经历了两场革命、多次地区和民族冲突后，选民的“革命疲劳”也防止了更多国内暴力的发生。

但在各方的警惕表现之外，此次表面上和平的总统权力交接展现出吉尔吉斯斯坦放下混乱的往昔、推动急需的改革的能力。这也显示出，吉尔吉斯邻国领导人普遍采用的精心设计的权力交接模式，并非唯一选择。

**新总统能否顺利前行？**



欧安组织赞扬了此次有序的权力交接，但也注意到滥用公共资源、向选民施压或者贿选等情形的存在。选举结果显示，该国三百万选民的投票率约56%，这一数字尚可接受，但热恩别科夫获得的选民支持率低于历任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未能合法地赢得选举——这种私下里广泛存在的观点潜藏危险，会煽动反对派、削弱总统推动关键改革所需的合法性。

作为一个乏善可陈的政治人物，热恩别科夫的选举借助了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而后者的任期即将结束。在吉尔吉斯政坛，政治盟友迅速变脸司空见惯，而热恩别科夫已经开始失去社会民主党内和该国精英的部分支持。另外，根据新宪法，总统的部分权力被转移给总理——另一个阿坦巴耶夫的亲信，萨帕尔·伊萨科夫（Sapar Isakov）——以及议会。阿坦巴耶夫总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认为自己是被上天派来拯救吉尔吉斯斯坦；而有些观察家暗示阿坦巴耶夫会在其任期结束后尝试获得总理之位。

热恩别科夫面临多重国内挑战。尽管阿坦巴耶夫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相对的稳定，但他的统治也被司法改革失败、官僚政治和腐败、以及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和社会躁动贴上了标签。公民社会结构削弱、经济移民增加。这些政策阻碍了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

一方面，吉尔吉斯社会发展出了较成熟的民主、追求公正和自由的选举，这在中亚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受区域族群影响的财政和政府资源分配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民意表达和候选人的质量。

引入改革将成为热恩别科夫的挑战，包括反腐改革——其竞选纲领中的核心内容。电力部门资费改革以及面向卫生、教育和司法系统地改革也同样必要。

热恩别科夫的外交政策也将同样富有挑战性，但与其前任的政策有所不同将给他带来一些好处。热恩别科夫的首要目标应是修复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此前，两国关系显著地因数周前阿坦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干预选举的激烈评论而恶化。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关闭进一步激化了吉尔吉斯国内关于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争论——2015年阿坦巴耶夫才把吉尔吉斯斯坦带进这个组织。近期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的交易显示出与莫斯科的关系仍处于正轨，但维护这种关系仍是热恩别科夫的首要任务。

同样的，他也要努力提升与其他重要伙伴如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欧盟关于谈判一个广泛协议的提议对于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的司法、民主和人权改革仍有一定吸引力，但缺乏俄罗斯或中国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

### 一个独特的国家

总统选举如此出人意料，阿坦巴耶夫依据 2010 年吉尔吉斯宪法上台却又在一个任期后离任，这样的事实在中亚地区显得非常特别。进一步地，整个国家看起来都接受了热恩别科夫的胜利。随其不断并入俄罗斯和中国的轨道，吉尔吉斯斯坦远不能成为该不自由的地区中的自由之岛，但它已经标识出了一条不同道路的可能性。

---

---

本文原题为“Kyrgyz election shows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ward in Central Asia”。本文作者为 Chatham House 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本文刊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权力与目标相匹配：有关南中国海的一项提议

Donald K. Emmerson/文 曹园/编译

导读：11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正式开启，这被视为他担任总统近11个月以来最重要的外访。在横田空军基地，他面对2000多名美日士兵大赞美国军力，称“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能低估美国的决心”“美国绝不会动摇”，而更多人紧盯的是，特朗普此行是否会阐明他的亚太政策。以南海问题为例，作者认为一味炫耀肌肉并不可取，美国应当明确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南中国海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排他性控制，同时为FSOP准则赋予更多现实意义，以扭转当前局面。编译如下：

“我们主宰天空。我们主宰大海。我们统治着这片土地和空间。”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站在驻军美军和巨大的美国国旗前，开始了他的东亚五国之行。他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占领天空、海洋、陆地和外太空，是因为拥有“最好的装备”和“最好的人民”，这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斗力量”。然而这些言论只停留在武力装备上，丝毫未谈及美国今后要采取的战略和想要达成的目的。尽管他的观众在鼓掌欢呼，但余下的行程中，我们更希望他能够解释美国打算提供什么，而不是渲染美国现在拥有什么。

公平地说，特朗普的确提到了“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与稳定”，包括“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且他还赞美了美国的盟友日本。然而，过分夸耀美国的军事力量却对其目的避而不谈可能让亚洲决策者和分析师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实质性保证。且不说如何区分领导能力和霸权主义，我们更关心具有美国特色的区域安全能带来什么？这个地区如何实现自由，它将向谁开放？除了炫耀美国肌肉之外，它促成了哪些具体的、共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亚太地区-美国利益？

在东南亚，这种实力与承诺之间的差距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就已经存在。2015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毫无疑问，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南中国海也不例外。”美国官员一次又一次地用这样的话来证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的合理性。虽然特朗普没有重复这番话，但是他在横田发表的言论也没什么新意。

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任何国家都可以自主“飞行、航行以及执行行动”（简称FSOP），但这一法条仍然缺少外在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引发东南亚担忧，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就算是放宽 FSOP 的标准，也仍然不能保证它的顺利实施。

FSOP 是全球通用的准则。特朗普此次行程最后将在菲律宾会见东南亚领导人，重点讨论全球海事安全问题，特别是未来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在南海进行捕鱼、资源勘探甚至是过境等活动是否需要征得中国的许可。

FSOP 认为法律优先，但中国在南海的成功证明“卷心菜战略”打败了包括国际法在内的规则引用，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价值已然降低。中国继续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而赢得了判决的“原告”马尼拉也决定不要求执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中国的资金、对中国愤怒的恐惧和美国偶然性的威慑所左右，功败垂成。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做出积极或持续的努力来动员国际社会增加对法院裁决的支持。

FSOP 让美国招致怀疑。尽管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似乎比很多其他国家更认真地在维护海洋法。有人认为美国对海洋法公约的支持是有条件的，甚至是虚伪的。就特朗普对多边协议的本土主义厌恶程度而言，这种不信任不会减弱。

FSOP 更像是美国的自我指涉。东南亚的所有国家中，无一能与美国在中国南海上空和海域的 FSOP 行动能力相提并论。国际法上的“任何地方”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更是天方夜谭。FSOP 承诺是给东南亚编织的美丽谎言，美其名曰要“帮助东南亚”，究其本质却是美国的自大和狂妄——“东南亚做不到的事情，美国全都能做到”。

FSOP 在南海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中国在南海采取重设、军事化、初步管制等行动，FNOPs 和 FSOP 都未能阻止甚至是减缓这些“南海中国化”的进程。事实证明，对于中国政府来说，FNOPs 和 FSOP 只不过是点麻烦事儿而已，这些根本不会撼动中国对南海的实质控制。

FONOP 和 FSOP 不该被丢弃，但是应该赋予它们一个现实目标：即美国将与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南海不受（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的排他性控制。

2017 年 11 月 14 日，特朗普与杜特尔特将出席在吕宋天使城举办的东亚峰会，两国领导人应该在此次峰会就上述提议进行正式磋商。

这将会给权力以适当的约束，改变长期以来把“扩张”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具体做法是：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实行单极化统治。它预

示着美国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南海问题上的战略部署，这符合全美国和东南亚的共同利益。

---

本文原题为“Matching power with purpos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roposal”。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负责人 Donald K. Emmerson。本文刊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在伊朗核协议上押注

James Dobbins/文 曹园/编译

导读：据美国官员称，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 13 日宣布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 2015 年国际核协议，不仅如此，他还会针对伊朗从导弹试射到支持暴力组织的一系列行径作出指责。如果特朗普认定伊朗没有遵循协议，美国国会将在 60 天内决定是否恢复此前中止的对伊朗制裁，继而可能导致伊核协议的撕毁。笔者认为对伊核协议的新立场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为避免总统不明智的决策，国会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伊朗核协议事件将成为对美国制衡制度的严峻考验。编译如下：

在国家安全领域经验有限的新总统往往会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有时甚至会让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当初约翰·肯尼迪总统决定以移民为中心、以中央情报局为组织在猪湾发起对古巴的入侵；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大幅增强美国参与越南内战的力度，派遣了数十万美国作战部队，以补充在其国内的小型咨询机构；罗纳德·里根决定介入黎巴嫩内战，包括结束对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兵营的轰炸以及随后的撤军；比尔·克林顿在干预索马里事务中的一些错误处理导致了“黑鹰”事件的发生；而最严重的是，乔治·布什仅凭有明显缺陷的情报就决定入侵伊拉克。这些决定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代价高昂的“新手错误”，有时甚至是由制造它们的总统所犯。

我们正处于美国现代史上最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在任第 9 个月。幸运的是与前任总统的早期任期相比，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安全领域还没有发生“初学者”的磕磕绊绊。

这种情况可能即将被改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拒绝国会授权证明伊朗一定会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承诺并废除其核武器计划的要求。据报道，他的确打算这样做，尽管他曾经反对所有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的建议并且已经两次证实了伊朗的遵从性，其中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情报部门的成员，他们都坚持认为伊朗仍然遵守协议。

核协议的替代方案是明确的：要么伊朗发展核武器，要么美国将发动战争来阻止这一进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是所谓“取消认证”的倡导者，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战争会是什么情形。“这一点毫无疑问，”汤姆·科顿说，“如果被迫采取行动，美国有能力彻底摧毁伊朗的核基础设施。如果他们选择重建，我们可以再次摧毁它，直到他们彻底放弃。”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持久战，类似于 1991 年至 2003 年期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伊拉克发动的那场跨度十多年的战争，包括持续的上空飞越和断断续续的轰炸。即便在那时，美国也不相信它已经成功地摧毁了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从目前针对伊朗的情况来看，美国不仅缺少欧洲盟国，还难以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支持，可能无法获得一些必要的发动战争的基础。除此之外，美国还面临着一个更有实力的敌人，和伊拉克不同，伊朗有能力从国外采购最先进的现代化防空系统。



据报道，特朗普指望国会将他从这样的结果中拯救出来。他显然希望取消对伊朗的认证，但国会已经撤回了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决定，并将其作为核协议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为了履行竞选期承诺做出的努力，同时避免不受欢迎和产生代价高昂的后果，比如与伊朗展开一场无限期的战争。

现如今美国人已经把代表整个国家的总统看作是平衡国会狭隘倾向的一个整体，毕竟国会的成员是由那些更狭窄的选区选举产生的。而我们现在的处境似乎是，我们必须指望国会来抵制行政长官的不明智和短视的政策。因此，美国的制衡制度可能很快就会经历一场不寻常的考验，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

---

本文原题为“Punting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外交和安全主席 James Dobbins。本文刊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

## 本期智库介绍

###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http://www.chathamhouse.org/)

###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